

第一章 抗日战争前夕的云南

一、抗战爆发前云南的形势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一个边疆、山区、多民族的省区。从 170 多万年前元谋人时代起，就有人类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和劳动。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发展长河之中，云南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组成部分。

进入近代以后，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门户的云南，也成了外国侵略者窥视的目标。那时，云南介于法国所属印度支那和英国所属印度、缅甸两大殖民地之间，成为英、法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的“后门”。^①19 世纪初，英国侵入缅甸以后，就计划开辟印度、缅甸到云南的交通，以便侵略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19 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以后，也企图进一步侵入云南，什么探测队之类的活动，络绎不绝。19 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云南更成为英、法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遇。

云南各族人民从来不屈服于黑暗势力和外来侵略势力的压力，多次掀起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古代如此，近代更是如此。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杜文秀起义、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抗法斗争、反对法国侵占猛乌、乌得的斗争、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权的斗争、昆明人

〔英〕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24—125 页。

民的抗法斗争、反对英军入侵的片马事件、周云祥领导的个旧矿工起义，直到辛亥、护国起义，一再显示了云南各族人民反抗黑暗势力和外来侵略势力的爱国主义精神。

清末的云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1905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会见云南留日革命人士时即指出：“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袭之下，易于鼓动奋起。”^①所以，同盟会成立不久，云南留日进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伸等即加入了同盟会，组成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办了宣传革命思想的《云南》杂志。随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建立，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担任讲武堂监督、教官等职务，控制了讲武堂大权，使讲武堂成为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随后湖南响应，川黔动摇，云南革命党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并且先后召开了五次秘密会议，策划响应起义，推举新军协统（旅长）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10月30日晚，昆明起义爆发，蔡锷和同盟会云南支部长、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李根源分别指挥起义官兵，向五华山及云贵总督署进攻。云贵总督李经羲、十九镇统制（师长）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等企图顽抗，组织力量反扑。重九之夜，昆明的战斗异常激烈，敌人被打死200余人，伤100余人；起义军亦牺牲150人，负伤300余人。^②所以说“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③战至第二日中午，起义军占领

《云南杂志选辑》李根源序，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冯自由：《辛亥云南省城光复实录》，《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1页。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了全城，昆明起义成功。而在昆明起义前三天，腾越（今腾冲）爆发了反清起义，迅速波及滇西地区，并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张文光为首的滇西军都督府。昆明起义成功之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

11月1日，起义官兵组织了云南军都督府，推举蔡锷为都督，李根源为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云南新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帝制，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云南各族人民彻底实现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是，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还没有维持100天，辛亥革命的果实就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窃据北京政权以后，倒行逆施，对内独裁，对外卖国，建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随后又杀害国民党人，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蓄谋复辟帝制，袁世凯竟然在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当起“中华帝国”的“皇帝”来了。这样，一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迅速展开，打倒袁世凯，成了举国一致的目标。

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的高潮中，武装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首先爆发于云南，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意志，而且在云南有自己独特的优越条件。云南不仅地处边远，北洋军阀“鞭长莫及”，而且当时已有之两师军队，素质较好，器械优良，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熏陶较深，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十分愤慨。章太炎也曾指出：“云南之域，山有点苍耸雪之峻，川有金沙、澜沧之隈，封守险固，地方广远，而去宛平绝远，藏天九地之下，则巨奸无所俯视，故能慎固经画，蹶起有功，比绩武昌，号曰中兴

焉。^①

其时，蔡锷被袁世凯调往北京，而由云南将军唐继尧主持云南军政工作。唐继尧在激进的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下，改变了暧昧态度，下定了反袁决心，并先后举行三次秘密会议，以作起义之准备。^②在云南武装起义即将爆发的时刻，蔡锷机智地逃出北京，于 1915 年 12 月 19 日来到昆明，这对云南反袁斗争是一个新的刺激。

1915 年 12 月 21、22 日，在蔡锷、唐继尧的主持下，滇军举行了第四、五两次会议，决定立即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并组织反袁护国军。12 月 23 日，向袁世凯发出通电，要求取消帝制，诛除帝制祸首等。25 日，云南方面即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讨袁，消息传出后，昆明“各界人民欢呼雷动，全市游行，高呼打倒袁世凯，拥护共和口号，至夜乃息”。^③这样，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云南组织了护国三个军，分别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为一、二、三军军长，并组织了护国军都督府，以唐继尧为都督。护国第一军向四川进军，第二军向两广进发，第三军留守和后援。蔡锷所率第一军主力入川，这是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抗击着数倍于己的兵力。

1916 年 1 月 27 日贵州宣布独立，响应护国。2 月 2 日，川军第二师在四川纳溪宣布独立，响应护国。这对护国战争起了积极的支持作用。1916 年 2、3 月间的 40 多天里，川南几乎“全部

章太炎：《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序》，《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02 页。

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云南图书馆 1917 年版，上册，第 15—16 页。

^③ 由云龙：《护国史稿》，《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4 期。

化为战场”，^① 纳溪三易其手，战斗十分激烈。其时，担任护国军支队长（团长）的朱德，率部坚守纳溪东面高地棉花坡，尽管北军昼夜不停地炮轰，使棉花坡松林被毁，毁落的松针达“数寸”之厚，^② 阵地仍然坚固地控制在护国军手中。

护国军四川前线战斗紧张之际，袁世凯任命的云南查办使龙觐光，率部从广西进击云南。同时，广东将军龙济光的侄子龙体乾等，勾结土匪，在蒙自滇南一带叛乱。唐继尧击溃了龙觐光的进攻，镇压了龙体乾的叛乱，巩固了护国军后方基地。接着，3月15日广西独立，四川前线护国军抓住有利时机，发起反攻，重新夺回纳溪，取得了重大胜利。

袁世凯虽于3月22日被迫下令撤销帝制，却仍把住大总统位置不放。护国军方面坚决不同意，继续进行斗争，广东、浙江先后于4月6日、12日宣布独立。5月8日，反袁独立各省在广东肇庆联合组成了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行使相当于国务院的权力。尽管军务院事实上没有能够发挥大的作用，但军务院的成立表明了护国军一定要袁世凯退位的决心。其后，陕西、四川、湖南又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一病不起，于1916年6月6日结束了可耻的一生。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护国战争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云南各族人民为护国战争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是永远值得肯定和怀念的。

当护国战争事实上已经结束之时，唐继尧却将护国三军扩大为八军之多，号称要会师武汉，大举北伐。^③ 这事虽未成为事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4页。

《董鸿铃入蜀讨袁日记》，《中华新报》1916年5月13日。

③ 庾恩旻：《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77页。

实，唐继尧却趁机大规模派兵入川，向四川扩张，遂酿成 1917 年 4 月和 7 月的两次成都巷战，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唐继尧堕落为滇系军阀头子的重要标志。当然，民国初年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正如毛泽东说，中国出现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原因，基本上有两条，“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

1917 年，孙中山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军事独裁，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掀起了护法运动，在广州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唐继尧虽然表面上拥护护法，但却别树一帜，打出了“靖国”的招牌，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肆行扩张。他说：“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②这是唐继尧玩弄两面手法的最清楚的说明。1918 年，在滇、桂系的怂恿下，护法军政府改组，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为此孙中山曾发表通电指出，滇、桂系宣告“自主”、“靖国”，但“态度犹属暧昧，似尚置根本大法于不问”。“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③唐继尧看到这个电报后，十分恼怒，他和他的秘书长竟在这个电报上批道：“无耻已极”、“一片糊说”。^④正是由于滇、桂系军阀的破坏，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49 页。

②唐继尧在云南驻广东情报联络人徐之琛 1917 年 9 月 12 日密电上的批语，未刊档案资料。

《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 年 5 月 4 日），《孙中山全集》第 4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71 页。

④唐继尧等在孙中山电文上的批语，参见《云南档案史料》第 1 辑第 62 页，1988 年 5 月版。

导致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

唐继尧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对内也加强了控制和掠夺，从而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1917年底至1919年初，在云南红河地区爆发了多沙阿波领导的反封建起义。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云南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并召开了上万人的国民大会，然后游行示威，声势浩大。^①表明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决心。

1921年2月，入川滇军顾品珍不满唐继尧的向四川扩张，乃率部回昆，逼唐下野。唐继尧在大军压境，内部分裂的情势下，被迫下野，流落香港。1922年春，唐继尧利用阴谋手段，收买土匪武装，实现了“二次回滇”愿望，重掌云南政权，但毕竟时过境迁，威风已大逊于当年。他先是参与“废督裁兵”大合唱，后又主张“联省自治”实行“民治”然而却重建“建国军”达十五军之多，自号“建国联军总司令”，重新经营对外扩张的事业。

1923年孙中山返回广州，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成立大元帥府。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继续北伐。孙中山再次争取唐继尧参加北伐，并任命唐为广州政府副元帥，唐仍拒绝接受，甚至与陈炯明勾结，试图进袭广东、夺取广州政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消息传到昆明，早先拒绝接受广州政府副元帥的唐继尧，忽然宣布在滇就职。很明显，唐继尧是企图以副元帥递补大元帥的缺位。广州政府当然不能接受，并宣布讨伐唐继尧。

1926年7月，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唐继尧仍执迷不悟，一方面与吴佩孚相勾结，另一方面又宣布“讨赤”，组织所

参见《滇声报》1919年6月9日、10日、11日、14日、21日的报导。

谓“民治党”提倡“国家主义”。^①

1926年底，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以后，立即组织了云南政治斗争委员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策划倒唐工作。^②在中共云南特支的促进下，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等四镇守使，于1927年2月6日实行“兵谏”，唐继尧被迫交出政权。这就是推翻滇系军阀唐继尧对云南14年统治的“二六政变”。延至5月23日，唐继尧“愤懑吐血”不治而死。

唐继尧下台以后，云南组成了省务委员会，进行统治，其实权却控制在龙云、胡若愚手中。龙云、胡若愚为争夺领导权，矛盾日趋尖锐。结果酿成了云南省内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三军的三年混战。

1927年6月14日，胡若愚派兵突然袭击了龙云在昆明的住宅，龙云被囚，但龙部实力未遭明显损失。这就是云南的“六一四政变”。然而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师师长。^③

龙云虽被囚，龙部卢汉等实力，在胡瑛指挥下，从滇西向昆明进逼，胡若愚不得已退出昆明，在昆明东郊大板桥与龙云达成“板桥协议”后，释放了龙云。龙云遂于8月13日回到昆明，就任了38军军长、云南省务委员会代理主席，从此开始了龙云对云南的18年统治。而到1929年才最后打垮胡若愚、张汝骥部，统一了云南。

参见《云南省长公署训令》，《云南公报》第1108册，1926年6月26日；《民治党成立日省长演说词》，《云南公报》第1275册，1927年1月20日。

杨静珊：《云南早期地下党对倒唐进行的工作》，《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14辑第5页，1983年版。

《云南公报》80，1927年6月24日，第3页。

龙云在统治云南的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尽力攀附蒋介石，镇压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屠杀共产党人。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几天以后又兼任了第13路军总司令。

1931年以后，日本法西斯势力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随着民族矛盾上升和蒋介石的排斥异己，使龙云在新形势面前不得不考虑新的选择。龙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整理、建设和控制云南的内部问题上，建设他想象中的“新云南”。^①治理云南，积蓄力量；立脚云南，以待时机。这是龙云后来得以较长时期立脚云南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龙云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首先在军事方面，1931年到1936年云南进行了整军和充实武器，使滇军素质得到提高，武器装备也比较先进。到1936年，滇军共编成6个步兵旅、2个直属大队、6个直属团、4个独立营、1个航空处，约36000人；此外各县还有48个营的“保卫队”，并且从国外购买了一批新式武器装备。滇军兵强马壮，武器精良，使国民党中央军杜聿明也大为感慨：滇军“拥有法式军火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②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云南才有可能迅速出动三军，达20万人以上，以支援全国抗战。

其次在财政税收和经济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据云南财政厅《财政月报》公布，1936年云南岁入总额为新滇币2800余万元，岁出总额为2300余万元，节余500余万

龙云1929年《在云南省政府委员会改组就职宣言中》中的话，参见《云南行政纪实》第1册。

杜聿明：《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回忆》，分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17辑。

元。由于扭转了多年的入不敷出的省财政，龙云有可能拨出专款，先后达 5000 万元，向国外购买武器。与此同时，经济有了发展，当时仅省财政厅直接办理的企业就有云南锡业公司等 39 个。^①又办理积谷，储备粮草，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云南全省积谷数量已达 2866737 石之多。^②云南本来粮食不能自给自足，抗战前下决心积谷，对于后来支援抗战有着重要的作用。

再次是改善交通，以促进云南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战争的需要。1931 年以后，在昆明设立了全省公路总局，龙云以省政府主席兼任公路总局督办，各县设公路分局，专主其事，修建滇东、滇东北、滇西、蒙剥（蒙自至剥隘）四大干道。滇东、滇东北两线是与四川、贵州和祖国内地联系的重要孔道；蒙剥线则是与广西、广东相联系的通道；滇西线则是打通云南西部，并开辟与缅甸联系的通道，此即后来的“滇缅公路”线。以这四大干道联通全省之公路网，全长约 6 千余公里。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滇东路首先通车。此外，云南与国际联系的通道，有早已通车的滇越铁路线。

龙云时期的这一系列改革，收到了相当的效果，成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一个引人注目的省区。1935 年 5 月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等人考察云南时，对云南的经济状况，良好的社会秩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美龄尤其夸奖昆明的市政建设，并感叹道：“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③这是昆明社会秩序的综合反映，在 30 年代的旧中国是相当难得的。跟随蒋介石来昆的《大公报》记者，把云南描

^① 《续云南通志长编》卷 7，上册第 78 页，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1985 年版。

郑崇贤：《滇声》，香港有利印务公司 1946 年版，第 11 页。

《蒋夫人言论汇编》，1956 年台北版，第 24—25 页。

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①蒋介石甚至希望中国的工业建设，从云南入手。总之，到抗日战争前夕，云南的经济状况已有了相当大的好转。云南在国内的形象好转，龙云也在云南站住了脚跟，并且为针对蒋介石企图控制云南进行的反控制的斗争创造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也为后来的坚持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

1934年底，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逆”军第10路总司令，以对付即将入滇的红军。龙云对红军的态度，主要采取尾追的办法，而不是堵剿的办法，希望尽快将红军赶出滇境，以避免蒋介石中央军以此为藉口派兵入滇，控制云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龙云出兵追剿红军，其实是追而不剿，与其说是对蒋介石的支持，毋宁说是对蒋介石中央势力插手云南的防御；与其说是对蒋介石中央的拥护，毋宁说是对云南地方势力的“维护”。

1934—1936年间，红军长征两次过云南，播下了红色革命种子。在红军长征过云南的影响下，于1935年底，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得以恢复和重建（1930年被破坏），重新领导和开展了云南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斗争。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是龙云思想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西安事变爆发后，龙云虽曾主张“靖暴戡乱，营救介公，刻不容缓”。^②但并未有什么明确的行动，因而给西安事变的主持人之一杨虎城造成了“龙云表示支持”西安事变的印象。^③西安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大大出乎龙云意料之外。龙云对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主张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表佩服。此

^① 《大公报》1936年5月15日、6月9日。

《云南龙云与各方面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

程思远：《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后，龙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云南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自身的团结统一和同盟军问题，它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胜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武器。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促进全民族的抗战，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抗日战争史，不能离开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研究；叙述抗日战争的过程，也不能漠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即使是一个地区的抗日战争史，也不能例外。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并进一步分割华北。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上海战争（“一二八”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上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发出《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4月15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同年12月发出《中央“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先后发出有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指示、宣言达八个之多。

1932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并有共产党员参与，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中华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同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影响下，发生了“福建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反蒋抗日，要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人组织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去。这个纲领，“已明显超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含有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向。”^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重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年6、7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华北局势危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7月至8月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新策略。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建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156—157页。

^②王首道：《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页。

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因此宣言的发表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于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实现了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报告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针，批评了关门主义倾向，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任务。

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共产党经历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继“一二九运动”之后，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正如张学良后来回忆所说：“我反对内战，厌恶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来停止内战。”^①经中共积极工作，排除干扰，蒋介石承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当时时局转变的枢纽。

^①《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9页。

1937年2月10日，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确认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扩大民主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并表示出抗战意愿的决议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标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这年的1月至9月，国共双方代表多次进行接触、谈判。5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在亡国灭种危机面前，全国各阶级各党派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①同一天，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②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到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就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直至取得抗战胜利的长时期中，中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具体实施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为此共产党必须冲破国民党顽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册，第341—342页。

同上，第345页。

固派的种种限制，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这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当然这种独立是“既统一，又独立”，是合作中的独立。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使统一战线得以健康地顺利地发展。

第二，共产党实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是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一环。针对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左、中、右三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以及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根本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对于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根据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精神，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思想，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强调了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目标的同时，对它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发展了抗日的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力量，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和分裂的逆流，促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战，对于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具有积极的意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云南的影响

1、云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云南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集团对日军入侵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全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和反对，云南各族人民激于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要求抗日。昆明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各中、小学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商人罢市，各报刊也纷纷发表抗日报导、评论。9月28日，昆明全市“闭市一天，志哀国耻”。各中、小学校学生上街游行，“沿途高呼口号，全省民众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封锁！一致誓死抗日！全省民众武装起来！对日宣战！……声震天地，不绝于耳。”^①10月3日，又在教导团大操场内，召开反日民众大会，会后游行示威，这是“昆明前所未有过的盛会，参加人数近3万人，除工人、学生踊跃参加外，有郊区农民6千人初次参加游行，民族工商业家也有大部分在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发动下参加了这次大会，部分商店停业一天，参加游行。”军官教导团的学员也参加了游行行列，加入了倒毁日本洋行的行列，并一度冲击了在如安街大厅巷的日本驻昆领事馆。^②在昆明的省立第一中学率先成立了学生义勇军，发表宣言说：“势至今日，非血战不足以图存，非效死不可以苟生。同人等负籍滇垣，求学一堂，惧大难之来临，哀国亡之无日，同仇敌

^①《云南民国日报》，1931年9月30日4版。

^②昆明市工商联陈子量稿件，转引自《昆明市志长编》卷10第288—289页，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12月版。